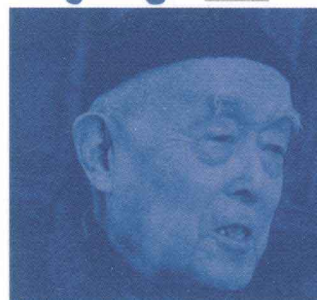


季羨林

故人情深



精选文集③

故人情深◎季羨林/著

胡光利 姜永仁/编

shwenbooks

季羨林精选文集③

故人情深



季羨林 / 著

胡光利 姜永仁 / 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人情深/季羨林著;胡光利,姜永仁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6

(季羨林精选文集;3)

ISBN 978-7-5155-0464-3

I. ①故… II. ①季… ②胡… ③姜…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876 号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12 金城出版社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季羨林精选文集③:故人情深

作 者	季羨林
编 者	胡光利 姜永仁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464-3
定 价	32.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遥念师友

- | | |
|---------------------------------|-------------------------|
| 我的第一位老师 / 2 | 回忆王力先生 / 97 |
| 我和济南——怀念鞠思敏先生 / 5 | 悼念曹老 / 101 |
| 忆念胡也频先生 / 7 | 哭冯至先生 / 104 |
|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 10 | 悼念周一良 / 108 |
| 回忆雨僧先生 / 13 | 悼念邓广铭先生 / 111 |
|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 15 | 忆念郑毅生先生 / 114 |
| 回忆陈寅恪先生 / 18 | 记张岱年先生 / 116 |
| 西谛先生 / 25 |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序 / 117 |
| 怀念乔木 / 31 |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 119 |
| 悼组缙 / 36 | 悼念沈从文先生 / 122 |
| 追忆李长之 / 40 | 回忆梁实秋先生 / 125 |
| 春城忆广田 / 46 | 悼巴老 / 127 |
| 忆章用 / 51 | 痛悼钟敬文先生 / 128 |
| 忆念张天麟 / 58 | 痛悼克家 / 130 |
| 哥廷根大学的老师们 / 62 | 我眼中的张中行 / 132 |
| 追忆哈隆教授 / 67 | 悼许国璋先生 / 136 |
| 迈耶一家 / 71 | 寿作人 / 140 |
|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73 | 悼念赵朴老 / 144 |
| 扫傅斯年先生墓 / 81 | 风雨同舟五十年——我和民盟的关系 / 146 |
| 晚年善终 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
(友兰)先生 / 84 | 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姜椿芳同志 / 148 |
| 回忆汤用彤先生 / 88 | 寿寿彝 / 150 |
| 忆周培源先生 / 94 | 郑午楼博士 / 152 |



品学论人

2

季羨林精選文集③
故人情深

-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 158
- 寅恪先生二三事 / 163
-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 167
- 《胡适全集》序——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 169
- 《赵元任全集》序 / 185
- 《汤用彤全集》序 / 192
-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 195
-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 201
- 我的朋友臧克家 / 205
-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 / 207
- 遥远的怀念 / 212
- 《畅谈东方智慧》序 / 217
- 《人生箴言》序 / 220
- 《董秋芳译文选》序 / 222
-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序 / 224
- 《透过历史的烟尘》序 / 226
- 《胡隼吟译〈学术论文集〉》序 / 228
- 《南国华声——周颖南创作四十周年》序 / 230
- 意匠惨淡经营中——漫谈卞毓方散文 / 231
- 《重返巴格达》序 / 235

· 遥念师友 ·



我的第一位老师

他实际上不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他之前，我已经有几位老师了。不过都已面影迷离，回忆渺茫，环境模糊，姓名遗忘。只有他我还记得最清楚，因而就成了第一了。

我这第一位老师，姓李，名字不知道。这并非由于忘记，而是当时就不注意。一个九岁的孩子，一般只去记老师的姓，名字则不管。倘若老师有“绰号”——老师几乎都有的——则只记绰号，连姓也不管了。我们小学就有“Shao qian”（即知了，蝉。济南这样叫，不知道怎样写）、“卖草纸的”等等老师。李老师大概为人和善，受到小孩子的尊敬，又没有什么特点，因此逃掉起“绰号”这一有时颇使老师尴尬的关。

我原在济南一师附小上学，校长是新派人物，在山东首先响应五四运动，课本改为白话。其中有一篇《阿拉伯的骆驼》，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寓言故事。我叔父忽然有一天翻看语文课本，看到这一篇，勃然大怒，高声说：“骆驼怎么能会说话！荒唐之至！快转学！”

于是我就转了学，转的是新育小学。因为侥幸认识了一个“驷”字，震动了老师，让我从高小开始，三年初小，统统赦免。一个字竟能为我这一生学习和工作提前了一两年，不称之为运气好又称之为什么呢？

新育校园极大，从格局上来看，旧时好像是什么大官的花园。门东向，进门左拐，有一排平房。沿南墙也有一排平房，似为当年仆人的住处。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偏西有修砌完好的一大圆池塘，我可从来没见过里面有水，只是杂草丛生而已。池畔隙地也长满了杂草，春夏秋三季，开满了杂花，引得蜂蝶纷至，野味十足，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倘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到这里，必然认为是办学的最好的地方。

进校右拐，是一条石径，进口处木门上有一匾，上书“循规蹈矩”。我对这四个字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难写，更难懂。我每天看到它，但是一直到毕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石径右侧是一座颇大的假山，石头堆成，山半有亭。本来应该是栽花的空地上，现在却没有任何花，仍然只是杂草丛生而已。遥想当年鼎盛时，园主人大官正在辉煌夺目之时，山半的亭子必然彩绘一新，耸立巍然。山旁的隙地上也必然是栽满了姚黄魏紫，国色天香。纳兰性德的词“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所流露出来的高贵气



象,必然会在这里出现。然而如今却是山亭颓败,无花无铃,唯有夕阳残照乱石林立而已。

可是,我却忘记不了这一座假山,不是由于它景色迷人,而是由于它脚下那几棵又高又粗的大树。此树我至今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春天开黄色碎花,引得成群的蜜蜂,绕花嗡嗡,绿叶与高干并配,花香与蜂鸣齐飞,此印象至今未泯。我之所以怀念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年连小学生也是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那四个字同今天的一些口号一样,对我们丝毫也不起作用。如果我们觉得哪个老师不行,我们往往会“架”(赶走也)他。“架”的方式不同,不要小看小学生,我们的创造力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有一个教师就被我们“架”走了。采用的方式是每个同学口袋里装满那几棵大树上结的黄色的小果子,这果子味涩苦,不能吃,我们是拿来作武器的。预备被“架”的老师一走进课堂,每人就从口袋里掏出那种黄色的小果子,投向老师。宛如旧时代两军对阵时万箭齐发一般,是十分有威力的。老师知趣,中了几弹之后,连忙退出教室,卷起铺盖回家。

假山对面,石径左侧,有一个单独的大院子,中建大厅,既高且大,雄伟庄严,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当年恐怕是大官的客厅,布置得一定非常富丽堂皇。然而,时过境迁,而今却是空荡荡的,除了墙上挂的一个学生为校长画的炭画像以外,只有几张破桌子,几把破椅子,一副寒酸相。一个小学校长会有多少钱来摆谱呢?

可是,这一间破落的大厅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我曾在这里因为淘气被校长用竹板打过手心,打得相当厉害,一直肿了几天,胖胖的,刺心地痛。此外,厅前有两个极大的用土堆成用砖砌好的花坛,春天栽满了牡丹和芍药。有一年,我在学校里上英文补习夜班,下课后,在黑暗中,我曾偷着折过一朵芍药。这并不光彩的事,也使我忆念难忘,直至今天耄耋之年,仍然恍如昨日。

大厅院外,石径尽头,有一个小门,进去是一个大院子,整整齐齐,由东到西,盖了两排教室,是平房,房间颇多,可以供全校十几个班的学生上课。教室后面,是大操场,操场西面,靠墙还有几间房子,老师有的住在那里。门前两棵两人合抱的大榆树,叶子长满时,浓阴覆盖一大片地。树上常有成群的野鸟住宿。早晨和黄昏,噪声闹嚷嚷的,有似一个嘈杂无序的未来派的音乐会。

现在该说到我们的李老师了。他上课的地方就在靠操场的那一排平房的东头的一间教室里。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数学、地理、历史什么的。他教书没有什么特点,因此,我回忆不出什么细节。我们当时还没有英文课,学英文有夜班,好像是要另出钱的,不是正课。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一个细节来:李老师在我们自习班上教我们英文字母,说f这个字母就像是一只大蜂子,腰细两头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所以一生不忘。他为什么讲到英文字母,其他字母用什么来比喻,我都

记不清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有一年春天,大概是在清明前后,李老师领我们这一班学生,在我上面讲到的圆水池边上,挖地除草,开辟出一块菜地来,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我们这一群孩子,平均十一二岁的年龄,差不多都是首次种菜,眼看着乱草地变成了整整齐齐、成垄成畦的菜地,春雨沾衣欲湿,杏花在雨中怒放。古人说:杏花、春雨、江南。我们现在是杏花、春雨、北国。地方虽异,其情趣则一也。春草嫩绿,垂柳鹅黄,真觉得飘飘欲仙。那时候我还不会“为觅新词强说愁”,实际上也根本无愁可说,浑身舒服,意兴盎然。我现在已经经过了八十多个春天,像那样的一个春天,我还没有过过,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李老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众多的小学老师,我只记住了李老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了吧。李老师总是和颜悦色,从不疾言厉色。他从来没有用戒尺打过任何学生,在当时体罚成风、体罚有理的风气下,这是十分难得的。他住的平房十分简陋,生活十分清苦。但从以上说的情况来看,他真能安贫乐道,不改其乐。

我十三岁离开新育小学,以后再没有回去过。我不知道,李老师后来怎样了,心里十分悔恨。倘若有人再让我写一篇《赋得永久的悔》,我一定会写这一件事。差幸我大学毕业以后,国内国外,都步李老师后尘,当一名教师,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当一辈子教员已经是注定了的。只有这一点可以告慰李老师在天之灵。

李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7月



我和济南

——怀念鞠思敏先生

说到我和济南,真有点不容易下笔。我六岁到济南,十九岁离开,一口气住了十三年之久,说句夸大点的话,济南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有我的足迹。现在时隔五十年,再让我来谈济南,真如古话所说的,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我想先谈一个人,一个我永世难忘的人,这就是鞠思敏先生。

我少无大志。小学毕业以后,不敢投考当时大名鼎鼎的一中,觉得自己只配入“破正谊”,或者“烂育英”。结果我考入了正谊中学,校长就是鞠思敏先生。

同在小学里一样,我在正谊也不是一个用功勤奋的学生。从年龄上来看,我是全班最小的之一。实际上也还是一个孩子。上课之余,多半是到校后面大明湖畔去钓蛙、捉虾。考试成绩还算可以,但是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名、第二名。对这种事情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但是鞠思敏先生却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个子魁梧,步履庄重,表情严肃却又可亲。他当时并不教课,只是在上朝会时,总是亲自对全校学生讲话。这种朝会可能是每周一次或者多次,我已经记不清楚,他讲的也无非是处世待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从他嘴里讲出来,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认真而诚恳的态度,真正打动了我们的心。以后在长达几十年中,我每每回忆这种朝会,每一回忆,心里就油然而起幸福之感。

以后我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校址在北园白鹤庄,一个林木茂密、绿水环绕、荷池纵横的好地方。这时,鞠先生给我们上课了,他教的是伦理学,用的课本就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书中道理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从他嘴里讲出来,似乎就增加了分量,让人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去遵照执行。

鞠先生不是一个光会卖嘴皮子的人。他自己的一生就证明了他是一个言行一



鞠思敏

致、极富有民族气节的人。听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济南以后，慕鞠先生大名，想方设法，劝他出来工作，以壮敌伪的声势，但鞠先生总是严加拒绝。后来生计非常困难，每天只能吃开水泡煎饼加上一点咸菜，这样来勉强度日，终于在忧患中郁郁逝世。他没有能看到祖国的光复，更没有能看到祖国的解放。对他来说，这是天大的憾事。我也在离开北园以后没有能再看到鞠先生，对我来说，这也是天大的憾事。这两件憾事都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我将为之抱恨终天了。

然而鞠先生的影像却将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时间愈久，反而愈显得鲜明。他那热爱青年的精神，热爱教育的毅力，热爱祖国的民族骨气，我们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国人民，不是还要认真学习吗？我每次想到济南，必然会想到鞠先生。他自己未必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当年认识他时还是一个小孩子，而今已是蹉然一翁的学生在内心里是这样崇敬他。我相信，我决不会是唯一的这样的人，在全济南，在全山东，在全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怀有同我一样的感情。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鞠先生将永远是不死的。

1982年10月12日



忆念胡也频先生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后者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



胡也频

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园子的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花坛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开满似锦的繁花,把这古园点缀得明丽耀目。枝头、丛中时有鸟鸣声,令人如入幽谷。老师们和学生们有时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

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天书”了。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现代文艺”,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来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的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



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

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

胡先生牺牲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七八岁,在今天还不算是太老,正是“余霞尚满天”的年龄,还是大有可为的。而我呢,在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内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在“空前的十年”中,几乎走到穷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学生变成了蹒跚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现在眼前,我有点困惑。我真愿意看到这个身影,同时却又害怕看到这个身影,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了。我又担心,等到我这一辈人同这个世界告别以后,脑海中还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彻底地从地球上消逝了。对某一些人来说,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里,我又有有点欣慰:看样子,我还不会在短期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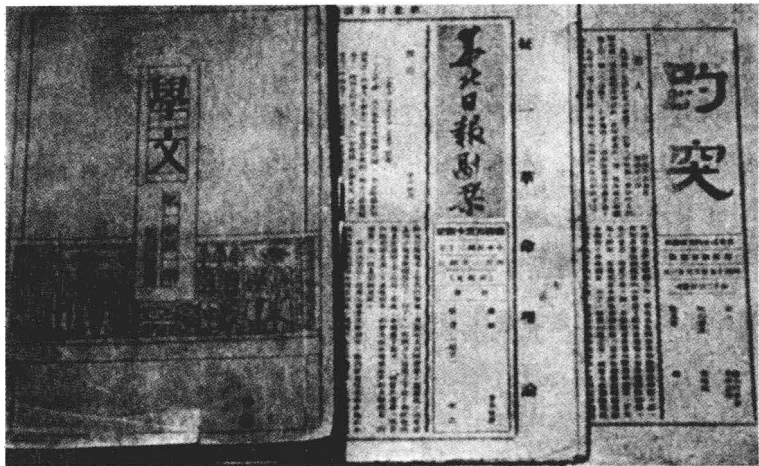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长信，我们在报刊上读过，现在收在《鲁迅全集》中。因此，面孔虽然陌生，但神交却已很久。这样一来，大家处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课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在地讲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的作文。他也讲文艺理论，却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来自旧文学，从《庄子》《孟子》《史记》，中间经过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灵感。这些大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是至关重要。后来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



中学时代,季羨林发表译作的刊物

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的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待了将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国。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

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这时候大概正处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

又过一些时候,听说董先生已经作古。乍听之下,心里震动得非常剧烈。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无已。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看来我只能抱恨终生了。

我虽然研究佛教,但是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再世转生。可是我现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计算了一下,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一个善人,坏事干过一点,但并不影响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愿奢望转生为天老爷,但我定能托生为人,不致走入畜生道。董先生当然能转生为人,这不在话下。等我们两个隔世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两个弱点经过地狱的磨炼已经克服得相当彻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1990年3月24日